

沙田雜記

梁庚堯（臺大歷史學系特聘教授）

2008年9月至12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任訪問教授，教兩門課。一門是大學本科的課，另一門是碩士班的課。中文大學的碩士班分成M. P.和M. A.兩類，M. P.必須寫碩士論文，M. A.只修課而不用寫碩士論文。M. A.的中文全名是「比較及公眾史學文學碩士課程」，強調終身學習，又分成全日制和兼讀制兩類，全日制一年即可畢業，最長三年；兼讀制只在夜晚及星期六上課，要讀兩年，最長四年。兼讀生大多已在工作，利用晚上進修，有些並非畢業自大學歷史本科，也有些年紀較大。有的M. A.碩士生，讀出了興趣，改唸M. P.，撰寫論文。

我在碩士班開的是M. A.的課，在夜晚上課，有如在臺大時教進修推廣部（從前的夜間部），不同的是臺大進修推廣部招收的是大學生。兩門課雖然分別開在本科和M. A.，可是都有本科生和M. A.研究生選課，為M. A.開的那門課，選課的本科生還比M. A.研究生來得多。目前香港各所大學的本科生，只要唸三年即可畢業（高中四年），但即將改為四年（高中三年）。中文大學在創校時原有聯合、新亞、崇基三所書院，後來又增加了一所逸夫書院，由於將改為四年制，學生人數會增加，所以又準備新設三所比較小型的書院來容納新增的學生。

中文大學歷史系教師的授課負擔，比臺大歷史系來得輕。我在這裡開兩門課，每門

課除導修外，兩節課是講授，每節課四十五分鐘。兩節課間有十五分鐘的休息，不過這裡沒有教員休息室，也不為教師準備茶水，和臺大的情況不一樣。由於課間休息的時間仍需留在教室，所以教師們大多連上兩節課，講足九十分鐘，中間不休息，提早下課，再讓要問問題的學生留下來提問，我也是如此。好在時間還不算太長，也就不會太累。講授之外有導修課，每學期四至五次，由任課教師設計學生有能力討論的問題，列出參考資料，選課同學分組討論，由系裡安排的助教帶領，教師不用親自參與。學生須事先寫好報告，在上課前分寄給任課教師、助教和同組同學。一個學期雖然有四個月，只有前三個月在上課，最後的一個月，是考試以及批閱考卷或學期報告、學期論文的時間。成績交給系裡之後，要經過校外審查委員的審閱，認為沒有問題，學校才認可。

我這學期教的兩門課，一門沒有遇到假期，講了十三次；另一門遇到一次放假，講了十二次，比起臺大每學期連期末考要上足十八週，短少好幾週。這裡的常任教授，第一、二學期合起來只需開三門課，可以一學期開一門，另一學期開兩門，也可以一個學期開三門課，另外一個學期專心做研究。暑假還有一個學期，可是開課甚少。

目前中文大學歷史系的常任教師（就如臺大的專任教師），分成教授和導師兩大等



學人專訪

級，教授中又分成講座教授、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導師則分成一級導師和二級導師。有些導師已取得博士學位，也有些沒有。二級導師雖然可以自己開課，但主要工作是幫教授帶導修課，一級導師則可以開比較多的課。導師任職有一定期限，期滿須檢討是否留任。系中的朱鴻林教授、梁其姿教授都曾在臺灣工作，為臺灣史學界所熟悉。有一位蔡志祥教授，是臺大歷史系畢業生，和陳弱水老師、周婉窈老師、吳密察老師是大學同班同學。另外一位二級導師胡芷妍，也畢業自臺大歷史系，和正就讀臺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的黃子寧是大學同班同學。胡芷妍同時在攻讀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學位，撰寫英國婦女史的論文。她的姑姑胡淑華也是臺大歷史系畢業，曾上過我講授的「史學導論」課，目前任職於澳門博物館，和陳慧宏教授、呂怡燕助教是大學同班同學。

宋史研究曾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一項傳統，也培養出一些人才。1984 年和 1990 年，還曾經召開過兩次宋史國際會議，1984 年那一次，促成了臺灣和大陸的宋史學者在相隔多年之後首次會面，兩次會議我當時都曾以晚輩的身分參加。不過目前中文大學歷史系雖然有些課程會牽涉到宋代，卻較少有專講宋代的課。蘇基朗教授原是研究宋代泉州，出版過一本講宋代到明初閩南地區繁榮和海外貿易關係的英文論著，也出版過《唐宋時代閩南泉州史地論稿》和《唐宋法制史研究》兩本中文書，在臺灣的《新史學》上發表過檢討學界對宋代一戶兩口現象各種不同看法的文章。可是據他自己說，研究題

目已轉移到近代，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范毅軍先生合作，執行蔣經國基金會補助的研究計畫。這學期他開了一門「中國法制史導讀」，我想宋代應該仍是課中的重要部分。有一位導師蕭錦華先生，從日本京都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已經有好幾年，研究唐代洛陽，開授「唐宋變革」。我在這學期開的「宋代科學社會」，算是惟一的一門專講宋代的課，另外一門「中國近世社會史」，宋代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與研究宋、元歷史學者聚晤，合攝於香港理工大學餐廳。左起：伍伯常博士（香港理工大學）、何冠環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朱鴻林教授（香港中大）、作者、張希清教授（北大）、鄒重華博士（北京學術交流中心）。伍、何、鄒三位先生均為中文大學培養出的學者。

專講宋代的課雖然少，但是宋史研究的傳統仍在，對這方面的研究仍然關注。我剛到這裡，張學明教授送我一本他和梁元生教授合編的《歷史上的慈善活動與社會動力》，這是他們在 1999 年召開的一次學術會議的論文集。集中多數的論文討論晚清以來的歷史，只有三篇論文討論較早的時代。在這三篇論文中，就有兩篇屬於宋代，作者分別是臺灣的黃敏枝教授和大陸的張文教

授。中文大學歷史系設有中國歷史研究中心，有一位助理梁偉基先生，研究宋史，在中文大學的《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和《新史學》發表過幾篇宋代政治史的論文。他研究宋史頗受曾瑞龍教授的鼓勵，曾教授從戰略的觀點研究北宋與遼、夏的戰役頗有成績，可惜在 2003 年英年早逝，對中文大學歷史系和宋史學界來講，都是一大損失。蘇基朗教授仍在指導幾個研究宋史的研究生，前兩年由蘇教授指導取得碩士學位的張曉宇，碩士論文已由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書名是《奩中物：宋代在室女「財產權」之形態與意義》，他送給我一本。就碩士論文來講，這本書可說寫得相當好，也可以看出中文大學訓練研究生的成績。這裡的本科生仍然可以選修畢業論文，和臺大歷史系在大學部不開這門課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同。有一位選修我的課的本科生告訴我，他和另一位同學正在蘇教授指導下撰寫有關宋代的畢業論文。

這裡的一些學生所以能有比較好的表現，我想導修課的訓練可能是一個重要因素。一個學期的導修課次數雖然不多，可是在事先卻有良好的設計。到這裡之前，我只知道導修課是討論課，並不清楚上課方式。來了之後，助教幫我設計的上課方式，是每次都有幾位同學提出報告，每一位報告的同學都有一位同學評論，其他同組的同學參與討論，都要事先讀過參考資料，提出意見。不只報告的同學要先寫好報告稿，評論的同學在上課當天也要交評論稿。就像開學術會議一樣，可是比開學術會議有更多的要求。

有好些位本科同學交來的報告，都能閱讀比我開給他們的參考資料更多的研究成果，引據史料，提出自己的看法，有研究生報告的架勢，雖然論證不見得很充分，卻可以看出來肯自己去思考。同學們交來的評論稿，也可以看出來多能仔細閱讀過所評的報告及參考資料，指出所評報告的問題，並加以補充，有幾位同學可說相當敏銳。這些同學的表現，其實已超出我的要求和預期。自然並非所有的中文大學歷史系學生都能如此，有曾帶過導修課也有教學經驗的朋友告訴我，很多同學交來的報告連文字都不通順。不過我這兩門課班上的學生，卻比較少有這種情形。有一位同學雖然文筆較差，對於史實的認識了解也比不上其他同學，卻可以看出他頗為用功，能作跨學科的思考。在導修課中，助教和其他同學都對他的報告提出不同看法。這位同學可能不太習慣這種討論方式，認為自己的努力遭到挫折，較廣的視野也遭到漠視，寫信向我、系主任梁元生教授和比較及公眾歷史研究中心主任科大衛教授提出申訴。我收到信後，先回覆說會詳讀他的報告，然後再把自己對他報告的看法，一條一條詳列給他參考，讓他了解問題所在，以及可以改進之處。

負責帶導修課的，除了有幾位是系裡的導師之外，主要是由博士班和碩士班研究生來擔任的助教。助教領有獎學金，頗為優厚，不過工作也重。他們的工作和目前臺大的 T. A. 相類，卻可能更多一些。在開學之前，他們就要幫老師把課程大綱、課業要求和導修要求上網；又要將老師所開列的參考



學人專訪

書，都從學校的圖書館找出，放到圖書館樓下做為指定參考書，方便同學閱讀。開學後，他們要隨堂上課，把學生編組，安排導修時間和教室；他們也必須事先讀過所有的參考資料，才能帶學生討論，由於他們的研究範圍未必和課程有關，所以要下一些工夫。每門課只有一名助教，各組又安排在不同的時間上導修課，所以助教要帶學生討論同樣的題目不只一次。我的兩班學生都不多，就各分成兩組，如果學生較多，助教的負擔會更重。不過在這一個過程中，他們也可以學到很多，對於開拓知識領域和將來從事教學，都會有幫助。



▲與家人及兩名助教合攝於香港中文大學住家雅群樓外。左起：吳兆豐先生、作者夫婦、朱冶小姐。左後方建築物為逸夫書院文瀾堂。

我的兩名助教是博士班研究生，很能盡責。他們兩人都來自大陸，分別是南開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的碩士。這幾年中文大學歷史系來自大陸的學生有逐漸增多的趨勢，尤其以研究生為然。系中老師對這些學生的觀感不錯，認為他們肯用功，程度也好。但是

並非所有助教都那樣盡責，我聽說曾經有助教竟然忘記導修課的上課時間。不過在我這幾個月的身身體驗中，對助教帶導修課卻印象良好。總結來講，中文大學歷史系的導修課，在訓練學生和培育研究生兩方面都有其成功之處。

前面提到設在中文大學歷史系中的比較與公眾歷史研究中心，除了與歷史推廣教育有關之外，也推動學術活動，舉辦演講、論壇、學術研討會，並執行各項研究及服務計畫。2008年11月上旬，曾舉辦過一次「地方慈善無疆界」學術會議。開會的地點在校內逸夫書院文瀾堂，就在我住宿的雅群樓旁，於是就近去聽了一場。我對於中國歷史上的慈善活動雖然也有一點興趣，可是這次會議用的語言是英語，而我的英語聽講能力較差，也就沒有多聽。這次會議給我的特別印象是，會議的宗旨是了解不同地域的情形，他們邀請來發表論文的學者，除了來自香港本地、大陸、臺灣、新加坡等華人世界地區之外，其他分別來自印尼、土耳其、塞浦魯斯等回教世界地區，他們的講題也與回教有關。於是比較的地域，從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往西延伸到東南亞、南亞、西亞和亞歐邊緣。這和臺灣歷史學界舉辦國際學術會議時，國外學者常來自歐美、日本等地不同，也和臺灣歷史學界較不重視東亞以外亞洲其他地區的歷史不同。這些回教世界學者的學術水準如何，我不了解，但是這樣的做法，卻顯然為拓展比較寬闊的視野打開了一扇窗。